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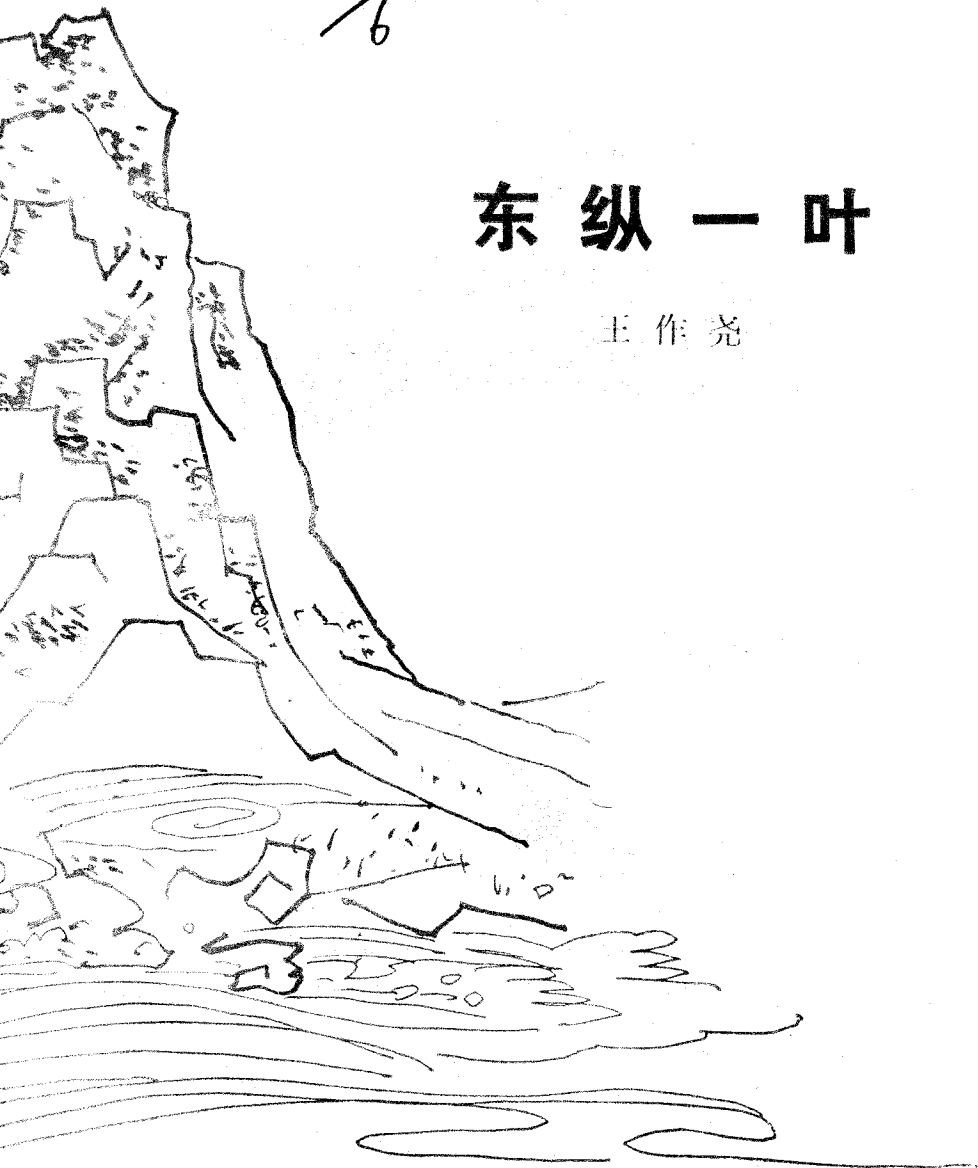
东纵一叶

王作尧

K265 /
6

东纵一叶

王作尧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东 纵 一 叶

(革命回忆录)

王作尧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4插图 22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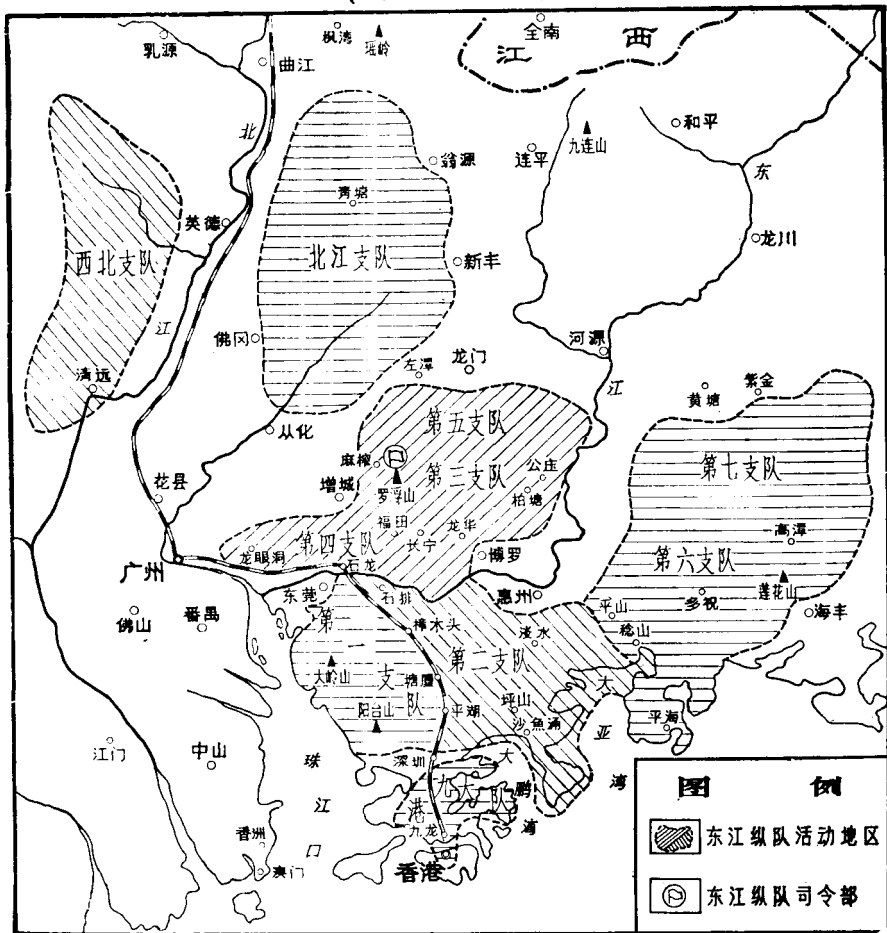
1983年6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231—86,030册

书号10111·1382 定价1.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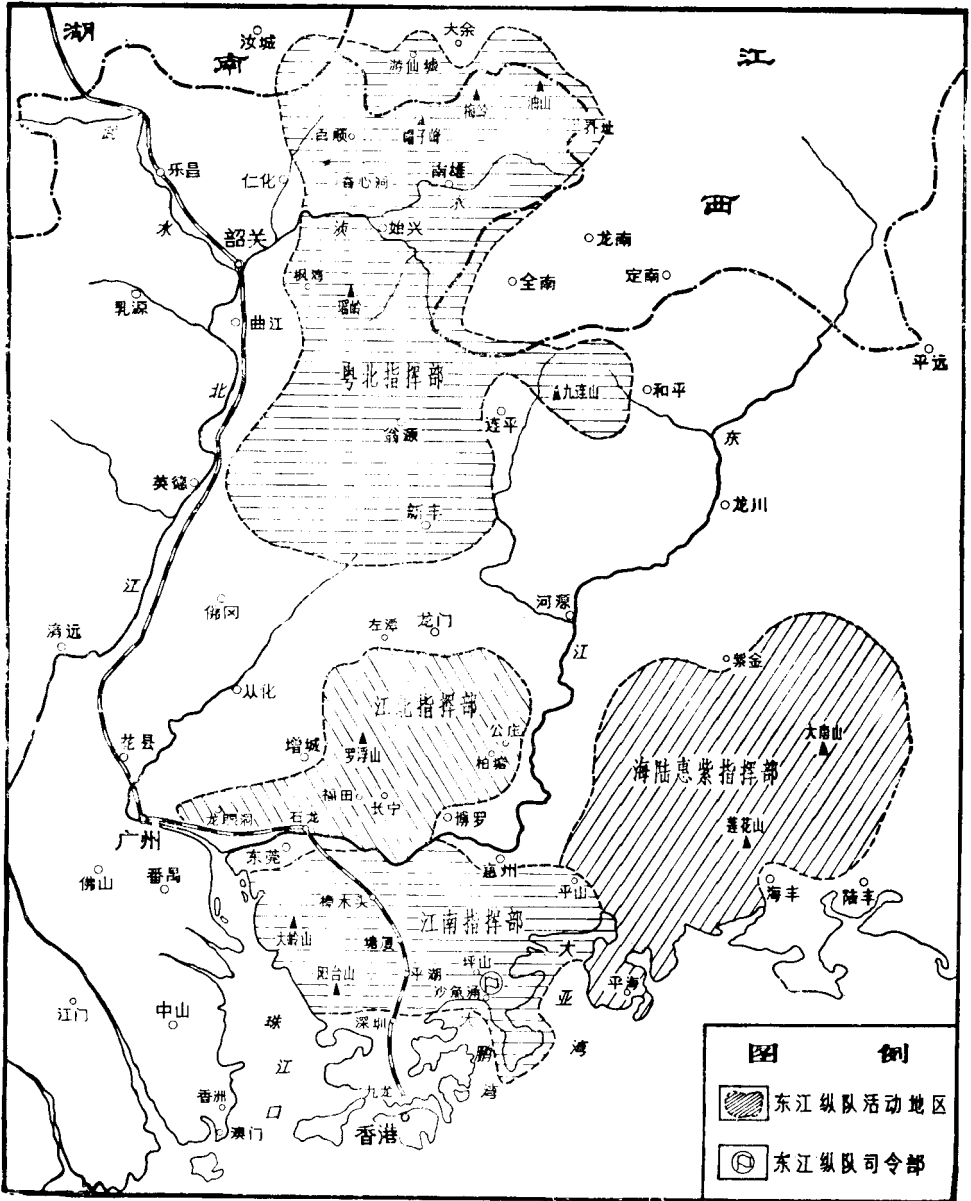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时东纵活动区域示意图

(一九四五年八月)



东纵北撤前活动区域示意图

(一九四六年六月)



前 言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同志们常常催促我，要我写有关东江纵队革命斗争的回忆录。但是，以前我总认为过去的斗争生活已成陈迹，戎马倥偬的旧事没有重提之必要，故迟迟不想动笔。

在动乱的十年间，林彪、“四人帮”之流把东江纵队诬蔑为“土匪部队”，把各种各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广大东纵干部的身上，这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否认广东有东江纵队，并把华南所有抗日游击队都说成是“土匪”，如出一辙。在林彪、“四人帮”之流肆虐之下，东江纵队的干部遭到了残酷迫害。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想办而办不到的事，却让他们办到了。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十年浩劫过去了，东江纵队的名字终于又和我们党的光荣历史联系在一起。

雨过天晴了，但十年的腥风血雨在我心中激荡起的感情波澜却不可抑止。我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为了那些浴血沙场、为国捐躯的东纵烈士，为了那些在“四人帮”淫威下坚贞不屈的同志，也为了让年青的一代正确地认识这段历史，我终于拿起笔来，写成此稿。

我之所以称这部小书为《东纵一叶》，意思是指它仅仅记录了我自己所接触到的那一部分，和整个东纵斗争史相比，只是

一叶而已。

愿此一叶，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写作之时，我想力求让史实说话，但因事隔三、四十年，虽然尽力而为，难免有挂一漏万之疏，张冠李戴之误；至于辞不达意的地方，一定不少。望读者们，特别是东纵的同志们不吝指正。

在我回忆和搜集材料过程中，得到许多老战友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作尧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章 武装起来	1
第 二 章 抗日枪声	18
第 三 章 白沙之战	36
第 四 章 敌后孤军	49
第 五 章 再接再厉	68
第 六 章 收编前后	88
第 七 章 东移受挫	107
第 八 章 重返敌后	139
第 九 章 风云变幻	154
第 十 章 紧急抢救	161
第 十 一 章 犬牙交错	172
第 十 二 章 胜利发展	189
第 十 三 章 东纵战旗	208
第 十 四 章 东江千校	224
第 十 五 章 四海英雄	232
第 十 六 章 抗日盟军	245
第 十 七 章 江北斗争	257
第 十 八 章 挺进粤北	276
第 十 九 章 在粤赣边	288
第 二 十 章 新的航程	302

第一章 武装起来

一

“当当……当当……”除夕夜，大钟楼的钟声刚刚敲响九下，我乘搭的一艘“花尾渡”^{*}，便拉响了汽笛，在浓雾中缓缓地离开了广州长堤码头。

这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我因为在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暴露了共产党员身分，被国民党特务尾追查捕，党组织指示我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参加东莞党组织的工作，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花尾渡”在黑夜中破浪前进，哗哗的流水声中，我又想起了几天前与广州市委外县工作委员会领导同志丘萃藻见面的情景。

“作尧同志，”一天傍晚，丘萃藻来到永汉路我居住的一间小阁楼中通知我说，“你在青年会中讲了两次有关游击战的课，国民党特务已经密切注意你，你不能再在广州呆下去了。”

几年来，因为宣传抗日的缘故，我曾经被国民党通缉，不得不东躲西藏，“七·七”事变以后，统一战线形成了，没想到

^{*}花尾渡：又称拖渡，一种用小火轮拖航的客船，因船尾漆着红绿花纹而得名。

在全国抗日高潮之中，我还得要离开这里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抗日有罪，真是岂有此理！”我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到处打击敌人，国民党消极抗日，造成广大国土的丧失和百万大军的大溃退，眼看着日军不断深入，到处杀人放火，大好河山惨遭践踏。华南也将成为前线了……”

“作尧同志，”丘萃藻笑着打断我的话：“别担心，工委正要让你到抗战第一线去。”

“抗战第一线？”

“是的。”丘萃藻点点头，严肃地说：“两广事变后，蒋介石中央势力侵入广东，但广东的实际统治者仍然是余汉谋。他在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下，曾经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抗日积极性，但是，他仍然坚持片面抗战的方针，把希望寄托在日、英的矛盾上，错误地认为日军不敢南侵。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是刻不容缓的。目前，党正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东莞很快就要成立中心县委，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武装，他们要求我们派个军事干部去加强领导。你是军校毕业生，加上又是东莞人，因此我们工委决定派你回去，在中心县委担任武装部长，争取尽快地发展东莞的抗日武装，迎接华南抗战的到来。东莞是广东的门户，作尧同志，这个任务你一定乐意承担吧！”

面临新的任务，我的闷气顿时烟消云散了。当时，我正负责组织一个前线工作队，准备到宝安去，接到新任务后，我利用春节前的几天，抓紧时间把剩下的工作做完，将组织名单交给接我工作的前线工作队队长王启光同志。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匆匆地赶上了往东莞的客船。

凉风象一把梳子细细地篦着我的思绪，此时此地，我开始慢慢地冷静下来了。考虑得更多的是今后的工作，怎样发展党领导下的武装？怎样才能把乡村用于械斗的武器掌握在我们党的手上？东莞的地形适合于游击战争吗？说实在的，我心中没有底。重担在肩，怎样才能不辜负党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任
务？我想得很多很多……

“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的。”洛川会议*向全党发出的战斗号召就象是黑夜中的启明星一样，给我指明了方向，使我增添了智慧与力量。

江上的寒夜被抛在前进中的客船后面，短暂的航程迎来了黎明，农历新年到了。

清晨，客船在东莞县城——莞城码头靠岸。

东莞县位于广东省中南部，东江下游，珠江三角洲的东北角。它东南与惠阳、宝安交界；东北接壤博罗；北与增城相邻；西北与广州、番禺、顺德隔江相望；西面的珠江口是祖国南方各地与香港、澳门以及太平洋沿岸国家往来必经之地，也是我国国防的前哨基地。

东莞县一部分处在珠江三角洲中，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到处都是稻海麻田，蕉林蔗地，是一个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

东莞是我的故乡，我的家就在离莞城不远的厚街。对于东

*洛川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莞，我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我特别喜欢东莞人民那种热情、爽朗的性格和勇敢、勤劳的优秀品质。东莞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着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南宋末年，当元兵南侵之时，有熊飞将军“军门一呼天地动，义士响应多如麻”的壮烈斗争场面；明末清初，东莞各乡纷纷组织起来抵抗清兵，水乡道滘一役，“血染春江半江水，士兵同时俱战亡”，歼灭清兵二千多人；他们气冲牛斗的英雄气概，直接激励了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东莞人民。将近一百年了，太平天国运动留下来的三合会组织在乡间还存在。沿海的虎门，是鸦片战争的战场，销毁鸦片的大池，炮台上的巨炮，都记载下东莞人民可歌可泣的战斗事迹。东莞人民用不屈的意志和满腔热血，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一九二五年，中国共产党东莞地方组织成立了，从此，工农群众便以主力军的姿态，出现在反帝反封建的行列之中。

如今，在抗日战争中，我参加了这一英雄人民的战斗行列，心里感到十分激动。

上了码头，我按照指定的接头地点，穿过西城门，往力行小学去找姚永光同志。

暗号对上了，姚永光同志连忙把我领进了宿舍。一进屋，他兴奋地握着我的手，忙不迭地问寒问暖，他说早就知道我这几天要来的了。从他那里，使人感到一股洋溢的热情。

老姚同志是外县工委委员，派到东莞来负责这一带几个县的党的工作。很快，我就从他口中了解到东莞党组织的情况。

我们党在东莞的工作基础是较好的。大革命失败后，东莞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全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抗日怒潮，东莞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开展起来。

莞中学生张广业、陈昶、王士钊等进步同学通过《农村战线》小册子的散发，认识了在广州工作的共产党员陈健同志，从而取得了与党的联系。不久，在“中国青年抗日大同盟”广东的负责人王均予同志领导下，于一九三五年六月成立了“中青东莞分盟”，一部分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共东莞特别支部正式成立，领导同志为王启光、王士钊、张联等。还有张广业、王河、王鲁明、谢阳光、赵学等一批老党员积极开展工作。一九三七年八月，上级党委派姚永光到东莞，成立了中心支部，姚永光任书记，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

这时全县的党员有三十多个，其中有一半在农村，一半在县城。

我来到，加入到中心支部，老姚很高兴。我们分析了当前情况，都认为：要发展东莞地区的革命武装，必须首先尽快地发展、壮大党组织，将自卫团等武装掌握在我们手中，并且成立由党领导的武装小组。于是老姚和我便作出了分工，他留在县城，我先到农村联系。

工作即将开始了。我想，春节前后城乡流动的人多，便于活动，决定不放过这个好机会，立即往农村去。

二

乡村有个习惯，旧历年的头两三天，不出门远行。厚街有个支部，要去联系，老姚认为我还是先去厚街为好。一方面免得引起别人怀疑，说我回到家乡也不在家里过年；另一方面，回家看看母亲也是应该的。

年初二清早，我便告辞了老姚，步行二十多里，回到了厚街。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家了。

我家是个封建大家庭，祖父是清朝的武举人，在乡村中横行霸道，算是个“大人物”，乡中总是由他“坐局”。在我八岁那年他就死了，家道立即衰落下来。不久，家产就只剩下一座大屋和四、五亩田地。

在这样一个封建没落的大家庭中，起了巨大的分化。我和琪妹以及堂兄启光为了求学，先后离开了家庭。后来，随着“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涨，一九三五年，我们都在广州参加了革命工作，到一九三六年都先后参加了党。参加革命以后，我和政治上反动的父亲分道扬镳，对于这个封建没落的家庭，没有什么感情，但我常常想念我的母亲和几个弟妹。

母亲原是贫苦人家之女，自幼丧父，我外婆纺麻度日，无法养活她，就把她卖给一个小地主当养女，长大后嫁给我父亲，生了第六个孩子以后，父亲就抛弃了她，跑到外头寻欢作乐去了，她孤零零地带着两个小儿子，纺线维持生活。她日夜操劳，还是欠了满身债。几年前，我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副排长的时候，经常给她寄些钱，脱离军队后，就再也没有钱寄回家了，可想而知，母亲的日子是多么艰辛。

母亲的头发已经开始发白了，额头又添上了几条长长的皱纹。她微笑着看着我，除了高兴以外，没有别的表示。长年的屈辱、孤独的生活使她变成了一个善于掩饰痛苦的人，虽然在她的心灵深处理藏着多少辛酸的泪。

母亲从不问我们在外头干什么，更不知道我们参加了革

• 坐局，掌握政权之意。

命，但从她的表情看得出，她对儿子的正派是深信不疑的。

“怎么，大冷天还穿着单衣裤？”母亲看到我穿得少，就翻箱倒箧地给我找衣服，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件可以保暖的。这时候，伯母在对屋看见了，就把堂兄启光在日本留学时穿的一件呢大衣拿过来给我，红着眼圈说：“拿去穿吧，阿光是不要的了。”

我知道启光哥留学回来后，因为反对父母逼他盲婚，离家出走，临走前留下一张纸条说这辈子再也不回来。看到启光哥这件衣服，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好默默地接了过来。

我在家里住了两天，除了接收厚街党支部的组织关系外，也抽出一些时间帮母亲干些活，还给她讲了一些城里的事情。

要走了，我不得不告诉母亲，今后我在莞城教书，钱很少，只能养活自己，还望她多多原谅，以后有空我一定常回来看她。

说实在的，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以后我看她的机会更少了，也正如我跟她说的，不可能给她寄钱了。一路上，我边走边想，什么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母亲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是为一切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而奔忙的，到那时，她就会真正的理解我了。

“抗战刚刚开始，工作还多着呢。”远处，莞城黄旗山的轮廓已隐约可见，我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不禁加快步伐，向前走去。

旧历年初四，我回到莞城。年初五清晨，便开始了接收各地党支部和组织武装小组的工作，前往高埗、东坑、大朗、清溪、平湖、山厦等乡村。

高埗在莞城的西北面，是我们在水乡较大的据点。

东莞的水乡占了全县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河网纵横，是“出门见鱼虾”的富饶之地。但是，对我们开展游击战争，它并不是理想的地方。一方面由于土匪恶霸多如牛毛，把水乡分割成一块块的“独立王国”；另一方面，由于交通不便，难以迅速转移。高埗之所以能成为我们的据点，主要是这里群众基础好，一九三六年张广业、陈前、卢克华同志在高埗小学当教员，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信。他们发展了好几个农民党员，并且用各种名义购买了十几条枪，秘密地组成了武装小组。

我到高埗接收了组织关系，见到了武装小组的陈前同志。

陈前长着黄黄的头发，高高的鼻子，有一双活泼的蓝眼睛，活象个洋人，因此他有一个绰号叫“番鬼陈”。他原来是新会一间师范学校的学生，一九三四年师范学校组织学生到东莞来实习，实习过后，他就留在东坑小学，后来张广业把他介绍到高埗小学。陈前热情、能干，他在一九三七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处处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和过人的才能。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出墙报，演街头剧，深入到农民家中做宣传工作，他利用自卫团的名义参加训练，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是我们党搞武装斗争的好同志。但是，据说他曾经崇拜过无政府主义。我想，革命的武装，必须有铁的纪律，因此，在到高埗的第二天晚上，我便有意识地和陈前单独倾谈。

在熠熠的煤油灯下，陈前显得很兴奋，特意到学校旁的一间小店买来一瓶五加皮酒，一纸包花生，说：“我们躲在乡村什么也不知道，你刚从广州来，今晚就多谈些大城市的救亡运动，好让我见识见识。”我把广州的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向陈前介绍了一番，然后把话题转了过来，向他问道：“陈前同志，听说

你曾经崇拜过无政府主义。”

陈前一怔，但随即诚实地说：“是的，我崇拜过，那是在找到我们党之前。”

我进一步问：“无政府主义对抗日如何看的呢？”

“无政府嘛，信仰也是无政府的，随便！抗日嘛，要抗，因为日本是有政府的，是法西斯政府。国民党吗？他们有个‘国民政府’，也要反对。至于共产党，因为暂时还没有政府，所以暂时不反对。”陈前笑着说。

“如果共产党以后有政府，也反对吗？”

“那——”

“唉——”陈前拿起酒碗，呷了一口，长叹一声说，“正是呢，这个无政府主义真弄得人头昏脑胀，在中国，他们不顾人民疾苦，不管国家危亡，只图绝对自由的痛快，一边要反对日本侵略，一边又反抗日抗日的力量，真是发疯了。老王，别再提这个无政府主义，我恨透它了。”

“光恨不行呀，”我回答说，“要认识它对革命工作的危害性，更要在工作中处处严格要求自己……”

“老王，我明白了。”陈前激动地说，“我一定注意，今后你多帮助我吧。”

“人家说你很爱玩，好喝酒，有时候还跟一些学生跑到村中的庙里拔神像的胡须，剥菩萨的衣服，是吗？”我笑笑说。

陈前搔搔脑壳，不好意思地笑了。

谈话一直继续到深夜。从这个时候起，陈前同志成为我生死与共的战友。这次谈话有点戏剧色彩，几十年以后，这次夜谈的情景仍牢牢地保留在我的记忆当中。

第二天，我离开了高埗，转到东莞的山区。